當障礙研究遇到性別平等教育

張恆豪  建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障礙研究和性別平等教育乍看之下是兩條不相交的平行線。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反省障礙研究與性別研究對主流社會價值的批判與反省，其實可以看到許多的相關性。以下，筆者將簡化障礙研究的觀點與立場，概論障礙與教育、障礙研究裡的性別議題，以及障礙者教育中的性別議題。

什麼是障礙研究？

障礙研究是近一二十年來，隨著障礙者權利的提倡，逐漸形成的跨學科研究領域。過去，障礙者通常被認為是接受醫療體制、社會福利、特殊教育等領域提供服務或是被研究的對象。障礙研究的興起，強調的是障礙者本身的經驗、歷史與文化。障礙研究學會（Society for Disability Studies）更強調：「障礙研究認為障礙是人類重要的身份經驗。障礙對整個社會（包括障礙者和非障礙者）有在政治上、社會上、與經濟上的重要影響。」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中，女性主義者提出生理性別（sex）和社會性別（gender）的區別，英國的障礙研究先驅Michael Oliver指出身體損傷（impairment）和社會障礙（disability）的差別（Oliver, 1990）。前者指的是生理上、身體功能的缺損；後者泛指各種社會結構、制度、文化上對個人社會參與上所造成之障礙。換言之，損傷或是身體功能的差異，不一定會形成障礙；障礙是社會文化因素所影響的。舉例來說，對輪椅使用者而言，有輪椅坡道的建築就不對她／他產生障礙，因為身體損傷依然存在，對不會說日文的臺灣人來說，在使用日文交談的環境中，她／他有語言溝通的障礙，雖然她／他身體的發聲功能沒有任何的損傷。聽障者，在以手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的社群中，聽力損傷就不是一種障礙。也因此，聽人的文化的倡議者強調：聽力損傷不是一種障礙，聾人是相對於一般聽人的少數族群，手語應該被認為是少數族群的語言。換言之，障礙的發生是身體損傷跟社會情境交互作用的結果。
Oliver（1990）進一步提出對障礙研究影響深遠的社會模式觀點的障礙（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強調障礙是一種社會問題而不是個人的問題，障礙的發生因為社會制度的設計沒有考慮到身體功能不同的人的差異，而產生的歧視效果與社會排除。如果性別研究批判的性別歧視／性別主義（Sexism）的壓迫，障礙研究批判的強調常能偏見（ableism）的意識型態。簡而言之，常能偏見認為身心功能健全才是一種正常的（normal）狀態，同時常能偏見也認為個人身體功能的損傷等同於個人的能力（ability）的不足，因為常能偏見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互動，障礙者經常被認為是跩的、沒有聲音的、可憐的、需要受幫助的，無法獨立生活的。在社會制度上，我們可以看到公共空間的設計沒有考慮身體功能的差異，而排除了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的可能。在工作、教育體制上，更可以看到對身心障礙者做不合理的資格限制。

由於受障礙者權利運動與障礙研究推動的正名運動的影響，在語言的使用上，美國已不再使用cripple（跛子、殘廢的人）或mentally retarded（智障）等歧視性字眼，也不再使用有次一等的人意涵的handicapped來指稱身心障礙者。改用「以人為中心的語言」（people first language），如：使用people with disabilities或者disabled person（障礙者）取代the disabled（這個殘障或障礙）。在臺灣相關的語言使用也在公共政策和日常生活用字上受到重視，「殘廢」一詞，將「殘廢」（身體的損傷）等同於「廢」（無行為能力）的用法，在1980年《障礙福利法》立法後已很少使用，「殘障」和「身心障礙者」的指稱方式則在一般日常生活中同時使用。

在法律保障與社會政策上，國際社會對身心障礙者議題的設計與實踐，逐漸從慈善照顧、保護、醫療的立場，轉向為權利模式的觀點。從循眾公眾的實踐觀點出發，國家必須提供必要的支持讓身心障礙者能實現「作為人的權利」（廖福德，2008；王國雄，2008）。其中的核心理念是以障礙為主體，構出促進障礙者的社會參與以及生活品質的制度設計。

### 障礙與教育

教育是基本人權的一部分。雖然在制度設計上，特殊教育包含身心障礙與貧窮優異，但在一般人的認知裡，特殊教育往往等同於身心障礙者的教育。障礙研究者常質疑，每一個人都是特別的，為什麼只有身心障礙者的教育被認為是特殊教育？對許多障礙研究者而言，所謂「特殊」教育，代表的是隔離、社會孤立與污名；然而，許多教育工作者仍然認為特殊教育可以保障每一個學齡兒童的教育權。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觀點看特殊教育制度與身心障礙學生的人數，我們可以發現，特殊教育體制的擴張與相關專業的形成數出，越來越多的特殊教育學生。換言之，我們可以質疑到底是我們的學生越來越「特殊」，還是教育體制對所謂「正常」的標準要求越來越高？

教育社會學家指出，特別教育是製造不平等的機制，被認為是特殊教育體制的學生難有向上流動的機會，看似客觀的特殊教育認定機制其實受到社會文化因素影響。相較於中上階級，勞工階級背景的學生有較高的比率落入特殊教育體系；因為語言及文化差異的因素，少數族群的學生也常有較高的比率被納入特殊教育體系，特殊教育標籤的污名化效果，更會影響身心障礙學生的自我認同與學習動機，面對這樣的挑戰與反省也使得特殊教育領域近年來開始轉向，提出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回歸主流（mainstreaming）、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等新的教學模式，以修正特殊教育的負面效果。然而，這些新的特教理念的實際操作方式與實質效果仍然有待進一步的研究驗證（張恆穎，2007）。

特別研究批判教科書中複製「爸爸看報、上班去、媽媽做家事」的性別刻板印象，在一般的學校教育場域中，學校教育如何建構障礙者的角
色？從障礙研究的角度分析教科書中的身心障礙者象徵，我們會發現，身心障礙者的角色在國小教科書中幾乎不存在。如果障礙者的角色出現，也是以兩極化的方式呈現；不是可憐、需要幫助的障礙者，就是邪惡的、醜陋的人身障礙，足以作「一般人」表率的障礙者，而身心障礙者的聲音是幾乎聽不到的（張恆豪、蘇畝山，2009）。

### 障礙研究裡的性別議題

過去，障礙研究幾乎不處理性別議題，預設身心障礙者都是沒有性別的。而女性主義運動雖然也開始反省女性經驗的異質性，特別是階級，族群與性取向，卻較少對身體功能差異反省，對性角色和族別的參與上仍缺乏無障礙環境的設計。從1980年代起，障礙與性的相互關係以及女性障礙者所遭遇的性別壓力開始受到矚目。就女性障礙者的處境而言，女性主義障礙研究學者Helen Meekosha（2009）指出障礙者普遍生活於貧窮之下，但女性障礙者的處境通常更糟：年輕的女性障礙者普遍的教育程度低於男性障礙者，女性障礙者比較不容易進入有給職的職場，不容易得到復健機會，比較容易受到公共空間的不友善；在私領域上，女性障礙者獨居或是和父母居住的比例高於男性，離婚率高於男性障礙者，結婚的機率低於男性障礙者，比較容易被要求控制她們的生育，比較容易經歷性侵害，成為家暴的受害者（Meekosha，2009：200-201）。

因為女性與障礙者的雙重特質，使得女性障礙者較於男性障礙者和一般的女性經驗有顯著不同。首先，女性的傳統角色：養育、母親、妻子、家務勞動者等角色被認為不適合女性障礙者，相較於男性障礙者與一般女性，女性障礙者的結婚機率較低，比較晚婚，離婚機率也較高。現代女性也許認為進入婚姻關係不一定是較好的選擇，而身心障礙者有更少的選擇機會。同性戀的女性障礙者也和異性戀的女性障礙者一樣，不容易建立長久、穩定的親密關係；再者，女性障礙者很容易被認為是需要被照顧的。觀念上，一般人很難想像女性障礙者可以做好照顧與養育的角色。很多人甚至認為女性障礙者不應該懷孕、生小孩或是養育小孩；為人母的女性障礙者常常被認為是不適任的母親，離婚的障礙者母親恨不得爭取到親權；女性障礙者也容易在申請領養小孩時遭受歧視（Traustadottir，1997）。

就性（sexuality）而言，一般人常認為性生活是激烈的運動，所以很難想像身心障礙者可以有性生活，女性障礙者的性更常因為她的障礙者身份而被忽略。障礙者女性被認為是無性的（asexual）、沒有性需要的，Fine & Asch（1988）就指出，在文學作品中，女性障礙者的情境象徵兩極化，不是性慾過於旺盛，就是天真、沒有性慾的。女性障礙者的女性特質往往因為障礙的身分而被壓制，也因此，性教育、節育、生產、性自主
權、性侵害防治等相關議題，常常忽略女性身心障礙者的需求。女性障礙者，特別是智能障礙者受到性侵害的比率也遠高於一般女性，即使是居住在機構中的女性也不例外。女性障礙者被強暴、墮胎、離棄子女也時有耳聞。對障礙研究而言，這都是一種對障礙者身體自主權的侵犯。

生育權（Reproductive rights）則是障礙研究領域與性別研究領域之間最具爭議的議題，女性主義障礙者批判生育權運動忽略被強迫結婚的女性障礙者。沒有為女性障礙者倡議生育的權利，同時，以胎兒的身體狀況為墮胎的理由是一種排斥身心障礙者、否定障礙者存在價值的意識型態。特別是在懷孕的女性接受諮詢時，優生學的觀點將障礙視為墮胎的決定性因素，隱含了障礙者不適合出現這個世界的偏見。反之，若以障礙者的角度出發，「生男生女都好，孩子如果不健康，還是可以很好。」

然而，障礙研究的學者其實不認為女性主義對身體自主權的維護、跟障礙研究對醫療能力侷限的批判是衝突的。墮胎決定涉及的是女性身體自主權，而障礙的形式和發生的時機是多樣的，產檢並不盡消減個案的所有身心障礙者。障礙者權利的倡議者應該要倡導，讓每個家庭理解身心障礙者跟一般人一樣有生存在社會上的權利，並且以社會應對身心障礙者提供的支援，產檢應該限制在嚴重的功能損傷，特別是會危及到個人生命（包括懷孕與孩子）與家庭的生活品質時。換言之，身體功能損傷不應該是墮胎的充要條件，墮胎的選擇應該是女性在評估她所處的社會條件與障礙者身體功能損傷程度後的選擇（Sharp & Earle, 2002）。

照顧（care）是另一個障礙研究與性別研究常被認為有緊密關係的議題。在傳統的社會分工下，無論是正式或是非正式的照顧工作都以女性為主。然而，障礙研究學者批評整個照顧的概念，認為照顧的優先性本身預設的障礙者是依賴的，沒有自主性的次等公民。障礙權利的倡議者會認為許多作為主要照顧者的母親，只希望障礙者「快樂的活著」，障礙者的父母其實無法理解障礙者的生命經驗，將障礙者的自主權，正式的照顧工作者往往以照顧顧問為名，實質上控制障礙者的身體自主權。因此，障礙者權利運動的倡議，要求找回照顧關係中的自主權，特別是在制度上要求由國家直接提供資源給障礙者，讓障礙者可以購買商品化的照顧服務，以獲得障礙者的照顧品質與自主性。

在照顧研究中，女性主義者指出，照顧工作多為低薪酬，需要承擔高情緒壓力的工作，多為女性擔任，從事照顧工作的女性常處於不平衡的剝削關係，再者，如果將所有的照顧工作都商品化，只會使得照顧者的勞動條件更差。在資本主義下，個人主義式的照顧關係將使得人與人之間失去最根本的情感連結，學者也指出，障礙研究與女性主義對照顧的主張並不衝突，制度上可以同時保障照顧者的勞動條件，同時確保需要照顧服
務的障礙者的自主權。重點是，照顧應該被認定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

女性障礙者的教育

相較於男性障礙者與一般女性，女性的障礙者的教育程度都比較低，特別的是，男性被認定為特教學生的比例高於女性，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似乎都比較合理。美國的研究指出：（一）課堂老師過於特別教育學生的主要原因，往往是因為學生習慣了一般的學校教學；因此，男性學生比較因為好動，影響課程秩序而被通報為特教學生；（二）教育體系比較重視男性的特殊教育，認為男性必須學習特殊技能才能養家活口，而女性的特殊教育需求很容易被忽略。（三）性別刻板印象認為男性比女性優秀，研究也指出，男性被認定為智能障礙者的智商的數量（IQ）高於女性，可能是在性別刻板印象中，女性被認為是邏輯不清、不夠、容易受情緒影響，換言之，社會對女性智力表現的期待較低，因此，女性不容易被納入特殊教育體制，除非她的智商遠遠低於正常（Arms et al., 2008）。
小結

相對於女性主義運動與性別研究的發展，障礙倡議運動與障礙研究的發展相對較晚，受到許多女性主義觀點的啟發。然而障礙研究也對女性主義運動與性別研究帶來更多的理論與實踐。如同美國在男性女性主義對白人女性主義帶來的挑戰，女性主義的障礙者研究者Meechamer（2009）就指出，如果性別研究提醒我們人群的分類不是被生理上的性別差異決定而一分為二，那麼障礙研究便是指出障礙者與所謂一般人也不是一分為二的兩群人；在性別差異之外，人類還有各種身體功能差異的可能。

身心障礙者的主要就是現代國家發展過程中建構出來的社會範疇。障礙者包含了異質性非常大的不同群體：視障者和智能障礙者也許分享了受歧視的經驗，但是異質的身體功能障礙對他們生活過程有很不一樣的影響。障礙研究才可讓我們進一步批判性的思考性別研究與性別教育中的體罰能力偏見。

在教育現場中，我們必須謹慎反省，障礙者不等於是無能的人，障礙者有自己的聲音與想法。社會文化條件的改變可以轉變障礙的狀況。在評估障礙者時，要注意階級，族群，性別如何影響我們認定誰是障礙者，再開始思考障礙者的性教育與性教育。同時，隨時反省我們在教育現場對障礙者的刻板印象，至同性親障礙者的教育經驗以及特殊教育體制的性別平等教育亦是值得反省的議題。

和女性以及其他弱勢團體一樣，障礙者的聲音與自主權常常在主流社會中被忽視。如女性主義的先驅提醒我們「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個人的即是政治的），障礙者倡議的共同語言是「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沒有任何關於我們的事情可以缺少我們的聲音），這應該是所有受壓迫團體的共同目標。